



新时期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本书编写组◎



|文|化|道|德|

新华出版社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文化道德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文化道德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文化道德》编写组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011 - 8894 - 9

I. 新… II. 新… III. ①爱国主义教育 - 中国 - 学习参考资料 ②文化事业 - 成就 - 中国 - 1949 ~ 2009 ③精神文明建设 - 英雄模范事迹 - 中国 - 1949 ~ 2009 IV. D647 G12 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8922 号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文化道德

责任编辑: 王 婷

装帧设计: 时代华语传媒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8894 - 9

定 价: 1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80842595

新华出版社

20 普普学园长《进指掌百》 41
17 焦耐德新法兴盛各 21
30 钻工品新禾芭合春乐园 31
48 181
09 目录 81
39 Contents 81
001 主重神阳表基表末 05
401 会场壁 15
201 韶热《！京南！京南》 25

目 录

Contents

一、新气象新风貌	1
1.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各项文化教育事业	1
2. 新中国新文化	7
3.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2
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16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戏曲改革	19
6.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	26
7.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32
8.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37
9. 五个一工程	41
10. 茅盾文学奖	44
11. 春晚	51
12.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56
13. 《印象·刘三姐》	61

14. 《百家讲坛》与国学普及	65
15. 各地兴起博物馆热	71
16.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76
17. 电视剧“四大名著”	84
18. 1990年国际孔子文化节	90
19. 动漫网游发展迅速	93
20. 东方歌舞团的重生	100
21. 红歌会	104
22. 《南京！南京！》热映	109
23. 走向世界的梁祝	113
24. 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17
25. 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	120
26. 孔子学院	126
27. 百年奥运梦圆北京	133
二、榜样的力量	140
28. 舍身扑敌堡的英雄——黄继光	140
29. 在烈火中永生——邱少云	143
30.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147
31. 一身正比泰山重——向秀丽	149
32. 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	153
33.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157
34.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杰	165

3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69
36.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	177
37. 奋不顾身舍己为人——张华	182
38. 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蒋筑英	185
39. 历史的突破——中国女排“五连冠”	189
40. 轮椅上的梦——张海迪	192
41.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196
42. 英雄在洪水中永生——李向群	203
43. 侠骨斗志永不褪——徐洪刚	206
44. 执法为民的典范——任长霞	211
45.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	217
46. 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丁晓兵	223
47. 新时期公交战线的杰出代表——李素丽	228
48. 学者本色亦英雄——孟二冬	237
49. “年度中国人的精神史诗”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243
50. 全国首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248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知识竞赛 100 题	252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知识竞赛 100 题答案	275
后记	276

1.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各项文化教育事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的对华侵略开始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对华以资本输出为主代替商品输出为主，在军事政治上则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侵略的需要，各列强就加紧了对华的“精神输出”和文化侵略。他们利用天主教、基督教等机构在中国创办学校，弘扬西方“文明”，奴化中国人民的意识，培养洋奴买办，借以建立和巩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彻底的反帝性质。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

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他认为，这样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而“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毛泽东提出了暂时的“监督和管制”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包括教会学校）的方针。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布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

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数千年来，教育主要是为剥削阶级服务，为统治阶级所掌握。新中国的建立从本质上改变了旧教育的性质，将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帝国主义在华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接管和改造，特别是结束了帝国主义一百余年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收回了教育主权，使教育事业在建国后短短几年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各类学校，因大多数由宗教团体主持或资助，成为“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危害中国社会的毒瘤（尽管在教会学校中一些外籍教员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教育教学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彻底摧毁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收回教育主权，是理所当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百废待举，我国政府对教会学校同对于其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一样，期望他们能恪守政府法令，一时未予处理，只是加以监督和管制，即容许他们暂时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必须禁止在学校课堂内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不允许强迫学生信仰宗教，宗教课程只能列为选修。同时，先后制定了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学校管理办法，令其遵守。

但是，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某些外国教会，竟然藐视我国的法令和政策，甚至继续不断地利用教会学校，暗中进行反动的

宣传和活动，造谣、诽谤，出版反动书刊，隐藏武器，勾结残匪特务，从事间谍活动。尤其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侵占台湾后，破坏活动更加猖獗起来。为了永久占领这些文化侵略据点，他们还施展种种阴谋，对师生威逼利诱，阻挠改革，甚至用断绝经费来源相要挟。

面对此情况，毛泽东号召同敌对势力斗争到底。他在 1950 年 6 月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现阶段我们的敌人的范围包括有五个方面，其中第五个方面，就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要“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政府从 1950 年下半年起就开始了接办教会学校。

首先接办的是的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于 1925 年创办的。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一向掌握在教会委派的外国人手里。北京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辅仁大学先后成立了工会和学生会，增添了马列主义课程，教会权力有所削弱。但是，天主教方面认为这些进步对他们不利，因此用尽一切办法加以阻止。1950 年 7 月 2 日和 14 日，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先后致函陈垣校长，公然提出下列四个条件，作为拨付经费的前提：一个新的董事会将由教会选任；教会经过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定权；附属中学经费自给自足；圣言会所在地仍由教会保留，不准任何人侵扰。并提出补助费由每年 16 万美元减至 14.4

万美元。信中并附有根据第二项条件提出不续聘进步教员的5人名单。这是明目张胆地对学校行政权的干涉，是人民政府的法令所绝对不能允许的。陈垣校长在请示中央教育部后，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7月29日，芮歌尼公然宣布“自本年八月一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费即告断绝”。为了保证辅仁大学3000多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不受损失，人民政府当即决定按期支付该校每月需要的经费。另外，本着公私兼顾和维持整个人民教育事业的方针，对芮歌尼的无理要求，仍继续采取种种解释和说服的态度，希望他能有所悔悟而撤回原案。但芮歌尼又自以为得计，继续四处活动，甚至企图组织新校董会撤换陈垣校长，使学校工作停顿。至此，人民政府已不能容忍。9月25日，教育部长马叙伦邀致芮歌尼到部谈话，阐明人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原则态度，正式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将学校收回自办，责令芮歌尼在本月内放弃一切无理要求。9月30日，直接听命于梵蒂冈的芮歌尼送给教育部关于“罗马停止拨付经费”的复电。这样，为了整个人民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报准政务院于10月12日明令将该学校接受自办，随即发表了《马叙伦部长为接办辅仁大学招待记者的书面谈话》。从此，辅仁大学彻底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辅仁大学的接办，给了其他所有教会大学和教会学校的师生以极大的鼓舞，也给了其他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大批教会学校的接办是从 1950 年底开始着手进行的。1950 年 12 月 2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各地把这件关于国家教育主权的重大工作做好，同时要深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分清敌我界限，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团结教徒和非教徒共同对付敌人。1951 年 1 月，教育部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拟定了处理方案。3 月中旬，教育部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文教组召开了华北区五省二市文教厅、局代表会议，拟定了华北各省、市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的具体方案。同时，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西南区亦先后于 2 月中旬至 3 月上旬，召开了会议，分别拟定了各区接受外围津贴的中等学校的处理方案。初等学校方面，均由各省市直接或委托专署处理。

在接办教会学校过程中，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五项基本原则，规定了对教会学校的基本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五项基本原则是：（一）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除非是他们的侨民自己设立而为教育他们的子女的学校，这是世界通例；（二）外国人在旧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它已经办了多年，所以必须在它真实的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暂时允许它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更绝对不允许新设这类性质的学校；（三）宗教与学校教

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不许任何曲解与含混，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四）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可以设宗教的课程，但只准是选修，而且不允许任何强迫与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五）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办法”是全国私立高等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上述五条基本原则是在《马叙伦部长为接办辅仁大学招待记者的书面谈话》（1950年10月）中提出来的。

至1951年底，全国已有753所大中小学被接收过来（其中大学20所，中学268所，小学465所），使18余万青少年儿童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下解放出来，完全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在教育战线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伟大胜利，又是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2. 新中国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相适应的。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了改革，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

早在第一届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

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为主要任务。提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国家对各类报纸、刊物、通讯社等舆论工具，采取根据其性质和政治态度分别对待的政策，逐步接管，取缔了帝国主义、反动派残留的舆论宣传阵地，建立起了传播革命思想和新文化的宣传阵地。对私营报纸、刊物、广播等事业进行改造，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这部分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同时，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还“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逐步建立了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中国人民为摆脱文化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历史现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教育方面，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接收了国民党政府所属学校，废除了国民党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国民党“党义”、“公民”等课程，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建立了共产党、青

年团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新学制，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特别是发展小学和中学，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创建工农速成中学等，努力解决教育向工农开门，确立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地位问题。1952年，人民政府又领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这次调整改变了旧中国在学校设置、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全国高等院校达到184所，其中文理科综合大学14所，多科性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等院校。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院校体系。通过这些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制，初步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影响，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也发展到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规模。1952年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总数为5445.1万人，比1949年和解放前最高年份都增加一倍多。与此同时，在全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工作。

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是确定“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统一

组织。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同时，为继承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提高了旧艺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旧艺人的生活工作条件。1951年初，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繁荣戏曲事业的方针；政务院也发指示要求对旧文艺进行改革，要求旧艺人在政治、文化和业务上加强学习。通过对旧文艺的改革，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投身于现实斗争，创作出了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革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人民电影事业也得到发展。到1952年底，共摄制故事片86部（包括1951年前私营厂出品的51部），纪录片57部，译制片101部。拍摄出《钢铁战士》《白毛女》《中华女儿》《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战士》《内蒙人民的胜利》《赵一曼》《上饶集中营》等优秀故事片，还摄制出《百万雄师下江南》《抗美援朝》等优秀纪录片。文学创作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老舍的文学剧本《龙须沟》等，还涌现出巴金、魏巍等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生活的一批优秀散文。一批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以反映时代变化和新人物新思想为主要特色的文艺作品的出版，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书刊出版方面，统一全国新华书店为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成立人民出版社等国营专业出版社；合理调整公私出版业的关系，按照分工专业的方向，划分国营与私营出版社出书的

范围和重点；促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影响较大的私营出版业实行联合经营，并有步骤地实行公私合营。这些措施，实现了全国出版业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逐渐消除了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现象，基本满足了建国初期人民对各种出版物的需要。1952年全国出版报纸16亿多份，杂志2亿多册，图书7.857亿册。

在科学工作方面，旧中国极为薄弱，全国解放时，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40个左右，专门的科研人员不到500人，科研成果也少得可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以便有计划地利用近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的研究，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的研究水平。党和政府帮助科学工作者认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引导他们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展科学的研究工作。到1952年，中科院已拥有包括多学科的31个研究所。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中国科学事业由近代落伍逐渐走向振兴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旧中国医疗条件极差，各种疾病猖獗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很短。1949年每万人口的医生数为6.7人，每万人口的医院床位数1.5张。全国每年约有1500万人死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积极发展卫生事业，防病治病，使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的